

珠玉词笺注

「宋」晏殊 著
王瑞臣 元心 笺注

教育出版社

珠玉词笺注

[宋] 晏殊 著

王瑞臣

笺注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1998年·哈尔滨

珠玉词笺注

ZHUYUCI JIANZHU

[宋] 晏殊 著

王瑞臣 开心 笺注

责任编辑:李 彤

封面设计:傅 旭

责任校对:耿 熹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)

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·印张5.75·字数100千

1998年4月第1版·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700

ISBN 7-5316-3377-9/I·109

定价:6.00元

前 言

(一)

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序》云：

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：楚之骚、汉之赋、六代之骈语、唐之诗、宋之词、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^①

宋词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，特别是其与唐诗、元曲鼎足而三，地位乃有目共睹。在其发展历程中，晏殊之功不可泯灭，已为历来词学家之共识。《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》：“晏同叔去五代未远，馨烈所扇，得之最先。故左宫右徵，和婉而明丽，为北宋倚声家初祖。”^②吴梅《词学通论》：“宋初如王禹偁、钱惟演辈，亦有小词。王之《点绛唇》、钱之《玉楼春》，虽有佳处，实非专家。故宋词应以元献为首，所作《浣溪沙》有‘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之语，为一时传诵。”^③在宋代，人亦充分肯定《珠玉词》之成就，谓“一时莫及”、“亦无其比”云云^④。然而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对晏殊及其

词评价不高，对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没有予以充分注视，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之事。吾侪不揣谫陋，利用工作之余作《珠玉词笺注》，历时一年，书稿甫就，故而对晏殊及其《珠玉词》，略陈管见如下：

(二)

晏殊(991—1055)，字同叔，抚州临川(今江西抚州)人。其世次晦显，迁徙不常，高祖晏璠，唐咸通中举进士，官江西，始著籍高安，曾祖晏延昌，徙于临川。晏殊七岁知学问，为文章，乡里号为神童。张知白安抚江西，荐之于朝，真宗召见，赐同进士出身，时年十四、五岁。十六岁迁太常寺奉礼郎，十八岁迁光禄寺丞，十九岁召试学士院，为集贤校理，二十岁迁著作郎。二十三岁守父丧，夺服起之，二十四岁同判太常礼院，二十六岁迁太常寺丞。二十八岁为升王府记室参军，迁左正言，擢史馆。以户部员外郎，充太子舍人，知制诰，判集贤院。三十岁拜翰林学士，为太子右庶子。三十二岁，迁右谏议大夫，兼侍读学士，加给事中。三十四岁迁礼部侍郎知审官院，为郊礼仪仗使。三十五岁迁枢密副使。因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，忤章献太后旨，坐以笏击仆折齿，罢知宣州(今安徽宣城)，数月，改知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。晏殊知应天，大兴学校，延范仲淹以教生徒，自五代以来，天下学校废，兴学自晏殊始。明年十二月，荐范仲淹为秘阁校理，时晏殊已召拜御史中丞。四十岁，知礼部贡举，欧

阳修以省元登第。四十一岁，为三司使，明年，改参知政事，迁尚书左丞。四十三岁，罢参知政事，以礼部尚书知亳州（今属安徽），坐撰李宸妃墓志未明言妃为仁宗生母事。四十五岁，自亳州徙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。四十八岁，自陈州召还为御史中丞三司使，与宋绶详定李照新乐。五十岁，自三司使刑部尚书除知枢密院事，加检校太尉枢密使。五十二岁，自枢密使加同平章事，明年，自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集贤殿学士，兼枢密使。欧阳修《晏公神道碑铭》载：“及为相，益务进贤材，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皆进用，至于台阁，多一时之贤。”^⑤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等为谏官，帝亦奋然有意，欲因群材以更治，而小人权幸者皆不便。晏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，谏官奏留不许，孙甫、蔡襄奏论晏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。坐是，降工部尚书，知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，是为庆历四年（1044）九月，晏殊五十四岁时之事。晏殊出知颍州时，与梅尧臣唱和。五十八岁，自颍州移陈州，范仲淹自邓州（今河南邓县）移杭州，途经陈州，来谒。明年，自陈州徙知许州（今河南许昌）。六十岁，迁户部尚书，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（即京兆府，今陕西西安），六十三岁自永兴军徙知河南，兼西京留守，迁兵部尚书，封临淄公。明年以疾归京师，六十五岁卒。脱脱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一有《晏殊传》，欧阳修《居士集》卷二十二有《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》，夏承焘《唐宋词人年谱》中有《二晏年谱》，欲详

其生平事迹，参阅传、铭、谱则可矣。

晏殊一生，历真、仁两朝，内政外交之大者，一为西北边事，一为庆历新政。对西夏用兵，晏殊颇主和议，欧阳修《晏公神道碑铭》载之甚详。“自公复召用，而赵元昊反，师出陕西；天下弊于兵。公数建言利害，请罢监军，无以阵图授诸将，使得应敌为攻守，及制财用为出入之要，皆有法，天子悉为施行……卒能使谋臣元昊听约束，乃还其王号。”^⑥而庆历新政，始作俑者当为晏殊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推恩信、重命令”十项整顿政事措施，枢密副使富弼亦上当务之策十有余条及安边十三策，仁宗曾加采纳，是为庆历新政，亦即《宋史·晏殊传》所载：“帝亦奋然有意，欲因群材以更治，而小人权幸皆不便”是已^⑦。新政遭章得象等人反对，夏竦指仲淹、富弼与欧阳修为朋党，五年（1045）正月，范罢知邠州（今属陕西）、富罢知郢州（今山东郢城），三月，韩琦罢知扬州，欧阳修上《朋党论》，为范、富辩护，八月，罢知滁州（今安徽滁县），新政终归失败。是时，晏殊虽罢知颍州，而于新政则始终支持有加。

《宋史·晏殊传》载：“文章赡丽，应用不穷，尤工诗，闲雅有情思，晚岁笃学不倦。文集二百四十卷，及删次梁、陈以后名臣述作，为《集选》一百卷。”^⑧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殊有《类要》，已著录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载殊有

《珠玉集》一卷。”文集不传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《全宋诗》册一收晏殊诗三卷。四库全书所收之《珠玉词》一卷，为毛晋刻本。

(三)

吴梅《词学通论》云：

词之为学，意内言外，发始于唐，滋衍于五代，而造极于两宋。……盖开元全盛之时，即词学权舆之日。旗亭画壁，本属歌诗。陵阙西风，亦承乐府。强分后先，终归臆断。自是以后，香山、梦得、仲初、幼公之伦，竞相藻饰。调笑转应之曲，江南春去之词，上拟清商，亦无多让，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。《握兰》《金荃》，远接骚辨。变南朝之宫体，扬北部之新声。于是，皇甫松、郑梦复、司空图、韩偓、张曙之徒，一时云起。杨柳大堤之句，芙蓉曲渚之篇，自出机杼，彬彬称盛矣。^①

论及北宋，则曰：

言词者必曰，词至北宋而大，至南宋而精。……余谓承十国之遗者，为晏欧。肇慢词之祖者，为柳永。具温韦之情者，为张先。洗绮罗之习者，为苏轼。得骚雅之意者，为贺铸。开婉约之风者，为秦

观。集古今之成者，为邦彦。此外或力非专诣，或才工片言，要非八家之敌也。^⑩

吴瞿安，一代词学宗师。《词学通论》初版于1933年，至今不失其精彩。然则其对晏殊及其词之评价，吾侪觉其尚欠允当。虽有“宋词应以元献为首”之论，但亦只因元献其生也早之故。至于评论：肇慢词之祖者，洗绮罗之习者，开婉约之风者，皆当有元献之力焉。故而吾侪曰：“晏殊及其词，承唐启宋，乃宋之婉约、豪放两派初祖。”析言如次：

(1) 晏殊之词，非承十国之遗，而承有唐一代之词风也。

词肇始于唐、滋衍于五代，唐词与五代词并非如有些词论家所谓之尽皆“浮艳绮靡”，而是区别有加，不尽相同也。词，原称曲子词，其产生之时限，吾侪以为五教授《文学史》“大约是在初、盛唐产生，从中唐以后流行”之说较为科学^⑪。唐代有民间词，亦有文人词，民间词得以流传至今者，皆在《敦煌曲子词》中，文人词多属偶或为之，孰先孰后，遽难断定，而有唐一代，以词著称者，惟温庭筠一人而已。然而唐词不乏雄浑之气，亦多厚重之思，敦煌神将，胡马燕山，汉家陵阙，咸阳古道，绝非凤毛麟角。而更多者则为江南春水，夜雨梧桐。飞卿有《握兰》、《金荃》之集，遂成鬓云腮雪之风，《花间》之韦端已，不失清新，中正之《阳春集》，渐脱粉腻，婉约之词实非浮艳绮靡，而浮艳之词，金杯花柳，划袜香阶，亦绝无婉约可言。欧阳炯《花间集序》云：“绮筵公

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；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按香檀。不无清绝之词，用助娇娆之态。自南朝之宫体，扇北里之倡风。何止言之不文，所谓秀而不实。”^⑫其所批评者，乃浮艳粗俗之词，而非婉约含蕴之风。晏殊词承接唐代诗词之余绪，沿袭韦端己，冯延巳之路，婉而不艳，不浮不腻，无樽前调笑之语，无花间缱绻之态，《浣溪沙》词曰：

淡淡梳妆薄薄衣。天仙模样好容仪。旧欢前事入颦眉。闲役梦魂孤烛暗，恨无消息画帘垂。且留双泪说相思。

唐宋小诗词写闺怨，名篇佳句多若繁星。而惟王昌龄之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^⑬，刘梦得之“凭寄狂夫书一纸”^⑭，皆以一句尽得风流，元献此词之“且留双泪说相思”，深婉不让“诗家天子”，简约有似“前度刘郎”，上承唐风已明矣。

（2）晏殊词珠圆玉润，含蓄蕴藉，乃婉约词中之清丽者。

词为文学，自唐以降，作品愈夥，内容丰富，风格多样，异彩纷呈。或含蓄婉约、或豪迈健举、或浮艳绮靡、或清新明丽、或粗俗轻佻、或自然直率……而最终形成两大主要格调，一曰婉约，一曰豪放，则是宋词两大功绩。宋代人王灼评晏欧词风为“风流缜藉”、“温润秀洁”，清人冯煦评晏词为“和婉而明丽”，晏殊开创宋代婉约词清丽之格。《山亭柳》赠歌者云：

家住西秦。赌薄艺随身。花柳上，斗尖新。偶
学念奴声调，有时高遏行云。蜀锦缠头无数，不负
辛勤。数年来往咸京道，残杯冷炙谩消魂。衰
肠事，托何人？若有知音见采，不辞遍唱《阳春》。
一曲当筵落泪，重掩罗巾。

是词颇似白居易之《琵琶行》，其对歌姬舞女之同情，乃唐宋词中所仅有，绝非佞红调笑之词所可比。或曰是词寄托其外放之身世，情同江州司马。诚若是，而其《浣溪沙》（阆苑瑶台风露秋）阕，“月好谩成孤枕梦，酒阑空得两眉愁。此时情绪悔风流”，为同情被侮辱、被损害者之词则无疑也。《珠玉词》写歌姬舞女，多有忍悲装欢，强颜媚笑之语，如“才送目，又颦眉。此情谁得知？”“断肠声里，敛尽双娥翠”，足见“太平宰相”、“富贵词人”颇有平等观念。《诉衷情》词：

数枝金菊对芙蓉。摇落意重重。不知多少幽怨，
和露泣西风。人散后，月明中，夜寒浓。谢娘
愁卧，潘令闲眠，心事无穷。

这一悲剧，不亦宋代之章台柳乎！《殢人娇》：

二月春风，正是杨花满路。那堪更，别离情绪。

罗巾掩泪，任粉痕沾污。争奈何，千留万留不住。

玉酒频倾，宿眉愁聚。空肠断，宝箏弦柱。人间
后会，又不知何处？魂梦里，也须时时飞去。

情侣生别，足抵半部《西厢》。《更漏子》“菊花残，梨叶坠。可惜良辰虚过。新酒熟，绮筵开。不辞红玉杯。蜀弦高，羌管脆。慢占舞娥香袂。君莫笑，醉乡人。熙熙长似春。”歌舞宴乐，极尽其欢，内容虽无足取，语言并不腻人，断非齐梁宫体可匹，亦非五代艳词可侔，元献之《珠玉词》虽“去五代未远，馨烈所扇，得之最先”，然已破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之樊篱矣。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“冯延巳词，晏同叔得其俊，欧阳永叔得其深。”^⑮确为的评。

(3) 晏殊以诗为词，以艳科写政事，豪放词风肇始于此。

八十年代之初，学术界尝有婉约、豪放孰为词之正宗，宋词有无豪放派之争，至今观之，不无可笑。词有流派乃为不争之事实，唐代词中即有豪放端倪。敦煌词中《菩萨蛮》（敦煌古往出神将）阙，有“不破娄兰终不还”之概；韦应物之“胡马，胡马，远放燕支山下。跑沙跑雪独嘶，东望西望路迷。迷路，迷路，边草无穷日暮。”^⑯同戴叔伦《调笑令》（边草、边草）阙一样，皆有盛唐边塞之音，不亦豪乎！词风豪、婉之分，既不关乎词为文学体裁之自身，亦不关乎词人个性之差异，而只取决于政治，即先决于政治题材，再决于时代政治，终决于词人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遭遇。一言以蔽之曰：以“艳科”写政治，必无缠绵之语，必无委婉之姿，无须清绝之词

以助娇娆之态耳。倘上引唐词不足为凭，而宋词则足可证之。有宋一代，豪放之词空前绝后，可谓起于斯，终于斯，其前但露端倪，其后便为余绪，惟有宋代，无论词人还是词作，格调豪放者俯拾即是也。苏子瞻“会挽雕弓”，贺方回“少年侠气”，张芦川“气吞胡虏”，岳武穆“怒发冲冠”，王安石、张于湖、陆放翁、辛弃疾、陈同甫、刘改之、刘潜夫、刘须溪，尽以豪放词著称于世。而有宋一代第一首豪放之作乃范仲淹之《渔家傲》：

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^①

宝元三年(1040)，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(今陕西延安)，主持西北边防防务，“大阅州兵，得万八千人，分为六，各将三千人，分部教之，量贼众寡，使更出御贼。……大兴营田，且听民得互市，以通有无。又以民远输劳苦，请建鄜城为军，以河中、同、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。”“又请修承平、永平等砦，稍招还流亡，定堡障，通斥候，城十二砦，于是羌汉之民，相踵归业。”^②此词即作于戎马倥偬之中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卷十一载：“范文正公守边日，作《渔家傲》乐歌数阙，皆以‘塞下秋来’为首句，颇述边

镇之劳苦。”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谓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一句，“苍凉悲壮，慷慨生哀。”晏殊《清商怨》：

关河愁思望处满。渐素秋向晚。雁过南云，行人回泪眼。双鸾衾裯悔展，夜又永，枕孤人远。梦未成归，《梅花》闻塞管。

此阕又作欧阳修词。晏欧词风极近，集中互混者不在少数，此词无论谁作，皆可看出晏欧乃范之同调，宋初词坛，绝非希文一人边音独奏。时代之政治为决定词风豪放与否之关键，南宋之词最为典型。靖康之难，二帝北狩，河淮沦陷，恢复之声，甚嚣尘上，岳飞之《满江红》，张孝祥之《六州歌头》，而至于辛、陆、陈、刘，无不同仇敌忾。康王南渡，易安居士之词风亦为之一变，婉约之词几消声匿迹，豪放之词终成时代强音，取婉约而代之矣。无视豪放之词者，岂止一叶障目，不啻信口雌黄。隆兴议和，偏安局定，婉约词风再度兴起，脱离政事之故也。而宋代词人以“艳科”写政事当始于晏殊。其《临江仙》云：

资善堂中三十载，旧人多是凋零。与君相见最伤情。一尊如旧，聊且话平生。此别要知须强饮，雪残风细长亭。待君归覲九重城。帝宸思旧，朝夕奉皇明。

是词作于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罢相守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时，本年正月，范仲淹自邓州（今河南邓县）移杭州，过陈谒晏，欢饮数日，别时赋此。范仲淹罢参政放外郡，与庆历新政失败有关，此词涉政事，以诗为词，不可不重视之。晏殊较此阕为早而涉及政事之词还有：《浣溪沙》（湖上西风急暮蝉）、（杨柳阴中驻彩旌），《采桑子》（时光只解催人老）、（林间摘遍双双叶），《少年游》（重阳过后），《渔家傲》（杨柳风前香百步），《瑞鹧鸪》（越娥红泪泣朝云）、（江南残腊欲归时）诸阕，其风格皆与婉约词迥异。故曰：“以艳科写政事，豪放词风肇始于此。”

（4）擅新声，多慢词，用典用事，填词之法益臻于完善。

晏殊于词学发展之此种贡献，似乎尚无人论及。本文试述之。晏殊博学多才，精于音律，史有明载：“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宝元元年（1038）四月乙亥，刑部尚书知陈州晏殊，以御史中丞兼本官，充理检使。同年十二月甲戌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晏殊，后为三司使。与宋绶详定李照新乐，在同年七月丙辰。”^①叶梦得《石林避暑录话》卷二载：“晏元献虽早富贵，而奉养极约。惟喜宾客，未尝一日不燕饮。而盘饌皆不预办，客至旋营之。顷见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，见每有嘉宾必留，但人设一空案一杯。既命酒，果实蔬茹渐至。亦必以歌乐相佐，谈笑杂出。数行之后，案上已粲然矣。稍阑即罢，遣歌乐曰：‘汝曹呈艺已遍，吾当呈艺。’乃具笔札，相与赋诗，率以为常。”^②其词亦有句曰：“小词流入管弦声”，

且多处写及音乐。诸如：“脆管清弦，欲奏翻新曲”、“楚竹惊鸾，秦箏起雁”、“朱弦翠管，移宫换调”，比比者皆是也。而其《玉楼春》词有“重头歌韵响铮琮，入破舞腰红乱旋”之句，刘攽《贡父诗话》曰：“‘重头’、‘入破’皆弦管家语也。”可见晏殊精通音律，擅谱新声。《渔家傲》、《谒仙门》皆其所创者也。《珠玉词》中，中调以上慢词约占十之三四，七十字以上之调即有《长生乐》、《拂霓裳》、《山亭柳》、《连理枝》，皆为其前人所未尝为之者。晏殊之《珠玉词》中用典用事，由引用到化用，可见填词技法之发展、演变，乃至完善之全过程。初步统计，晏殊现存一百三十多首词中，引用前人成句竟有十几处之多，至有不厌其烦，一引再引者，如元稹传奇小说《莺莺传》中崔氏之诗，“怜取眼前人”，即引用两次。晏殊用前人成句，虽在引用时略加改动，且与全阕融为一体而不显扞格，然总给人以面熟之感，自然影响艺术水准，使其遣词、造句、修辞、命意难于超越前人。而其有些词作，用典相当圆熟，颇有艺术技巧，从引到用，足见技法发展之轨迹。《鹊踏枝》：

紫府群仙名籍秘。五色斑龙，暂降人间世。海
变桑田都不记，蟠桃一熟三千岁。露滴彩旌云
绕袂。谁信壶中，别有笙歌地。门外落花随水逝，相
看莫惜尊前醉。

此词写歌舞燕乐，连用神仙典故，幻想神奇，不落游仙诗窠臼，足见晏殊为词之妙。《瑞鹧鸪》（江南残腊欲归时）阕，歌咏梅花，活用桃花源之典故，改桃为梅，“何妨与向冬深，密种秦人路，夹仙溪。不待夭桃客自迷。”不仅想象超凡，而且寄托词人理想，格调清新俊朗，迥非它词可比。唐人填词尚不讲用典，宋人则十分讲究，自北宋至南宋，愈演愈烈，至辛弃疾乃有掉书袋之诮。典不可不用，亦不可多用，取法乎上而得之于中则为难能矣。晏殊于用典用事，以诗为词诸方面，亦为开风气之先者，自李青莲而至晏元献，填词之技法益臻于尽美尽善矣。

（四）

晏殊《珠玉词》为学术界所共识之处，诸如思想内容之所谓局限，艺术手法之基本特征等等，本文则不拟论述，每阕词之传笺，已表达出吾辈之见解，读者诸君聊作参考，则已荣幸之至也。丁丑残腊，作于容膝斋之西壁。

注 释：

- ① 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影印本《王国维遗书》第 15 册，《宋元戏曲考》。
- ② 《宋六十一家词选》，转引自龙榆生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，第 66 页。
- ③ 吴梅《词学通论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65 页。
- ④ 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：“晏元献公、欧阳文忠公，风流蕴藉，一时莫及，而温润秀洁，亦无其比。”中国戏剧出版社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册一，第 113 页。